

冀朝鼎

一位光明磊落的潛伏者

馮同慶

著

開明書店

謹以此書
獻給敬愛的冀朝鼎伯伯和家父馮培桂

楔子	何為光明磊落的潛伏者？	
第一章	留美博士冀朝鼎隻身回國共赴國難	
	一、離開家鄉後的清華記憶	6
	二、博士論文中的長河行天下	11
	三、為統一抗戰而奉命回國	22
	四、潛伏助力抗戰貸款與平準基金會	30
第二章	冀朝鼎作為潛伏者為國計民生而勵精圖治	
	一、潛入孔祥熙系統致力於現代銀行建設	48
	二、持陳立夫簽章特別黨證以維護金融秩序	63
	三、戰後復員、迎接解放、聯合國職位中斷	76
第三章	冀朝鼎由潛伏者變身「禁運封鎖」「破冰者」	
	一、「另起爐灶」特殊環境中開拓國際外貿新局	94
	二、日積月累集成的政策建議被改革開放所證實	108
	三、與國際友人一起搶救中國文物傳播中國文化	121
第四章	冀伯伯與家父的家族世交	
	一、冀伯伯的父親見到家父稱「名公之後」	132
	二、冀貢泉爺爺對家父說「你該叫我老伯」	141

三、冀爺爺講「脫離父子關係」是權變之策	143
四、對貪暴的反感是普遍的	145
五、為了抗日的統一戰線	148
六、北池子大街留下的悲歡	153
第五章 冀伯伯與家父曾經隱蔽多年的祕密	
一、家父脫離「貴人」閻錫山	156
二、「你也可以向組織反映你的情況了」	158
三、家父的正常工作	164
四、冀伯伯與家父有過約定	169
五、家母沒有被告知實情	171
六、厚德福飯館的密談	175
七、公開了他倆之間隱蔽多年的祕密	178
八、我們稱冀伯母為「冀媽媽」	184
九、「爸爸寫得最好的一首詩」	189
十、晚輩心目中的家父與他的「朝鼎兄」	194
參考徵引文獻	200
後記	209

楔子

何為光明磊落
的潛伏者？

光明磊落的潛伏者？

與人一起做事，明者時做暗事，暗者常做明事：

明非明，暗非暗；

明非信，暗非疑；

明非正，暗非邪；

明非雅，暗非俗；

明非趣，暗非寡；

明非品，暗非鄙；

……………

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污明月色。

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索探為求其解救；而陷於驕縱，逢源至舉事不合。

似至晦，實至明，疑陰謀隱晦之潛伏者，用晦而明，實乃光明磊落之人。

天下事物，造因雖微，成果則大。

（冀朝鼎，《清華周刊》，1923年）

中國近現代史上冀氏父子（冀貢泉、冀朝鼎、冀朝鑄）引人注目，其中冀朝鼎，其中共黨齡與建黨幾近同歲而至今被紀念，卻成為史上大謎之局中人，被多種媒體盛傳「中共第一經濟間諜施展陰

謀致使國民黨敗退大陸」。

撰者為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見之於晚年回憶錄《成敗之鑑》之「揭祕」，所謂「我們的財政金融沒有搞好」，「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觀者、信者、傳者甚眾，然而大誤、大謬、大冤。

這段隱謎史自1943年進入節點，重慶—延安—新疆連接有望統一抗戰，冀朝鼎作為潛伏者進入孔祥熙控制的系統，此時家父成為冀朝鼎的私人祕書，直至共和國建立，身後留下自傳等文字資料，記述了這段歷史。

冀朝鼎乃「光明磊落的潛伏者」，當代中國金融、外貿、外交新秩序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開拓者，而冀家、馮家為世交，我哥哥、我幼年時兩家還曾一起居住、同在一條胡同，我們稱冀伯伯，促使我近年以家父自傳為線索，收集整理相關史料和信息，呈現真實的冀朝鼎。

冀朝鼎1927年加入共產黨，數次往返中國與美國，從熱血青年，到受命潛伏，為民族統一抗戰而用險。

專家身份、專業素養、專用心智，精深研究、設計為要、彌合國共，力促國家金融現代認知、規範、規則、規矩、體制，竭能阻止任性、腐敗、錯判所致銀行系統對民族利益的損害和國際責任的失衡，「為有關國計民生問題準備予萬一」。

希冀並力爭民族獨立、國際外交、外經外貿新的局面和前景，為最早在聯合國組織中任職的一位中國籍官員和中國代表，主持組建所屬亞太區域組織，人有所志，史有所進，牽連起與父親冀貢泉、與小弟冀朝鑄隔代際、隔時段卻相承相繼的聯合國之望。

冀朝鼎清華學校畢業後留美，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志在成為外交家，力取力保公開身份，跨國共「祕密黨員」「特別黨員」。

密鑰為「應付環境」「不要亂來」，「暗事」明做，借力合力，

憑信和倚重學誼、鄉誼、業誼，結交三教九流、游走五行八作，識才、惜才、留才，化解政爭、編織人脈，身在江湖而處江湖之遠。

繼而在共和國初創時期，「一邊倒」「另起爐灶」特殊背景下，一種「新的潛伏」，成為「禁運封鎖」的「破冰者」，國際公認為「與世界開展貿易事務的連絡人」。

一如而立之年曾研習「河川之國」，著有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筆下之黃河—運河—長江—西江—海河匯流，匯入世界的湍流，竟然一唸經年，親身經歷踏入了這一湍流，還想着趟開這一湍流，互交流、互貿流、互匯流、互學流……篤信天下有長河，長河行天下。

青年冀朝鼎曾為「異數」，不從包辦婚姻，拒絕才貌雙全女子。而懷常人之情，相濡以沫，與猶太妻子一見鍾情，又被迫分手，至留下兒子延續血脈。

後有「黃嫂」的撫慰，還有了共同的女兒「女黃河」。

盛年之後，與一起走過後半人生卻「清貧」而「富有」的冀伯母，相扶相助，而在身後，妻承夫志，捐獻覓珍淘寶之數百件文物，留駐在博物館裏，達成煌煌集藏。

明人不做暗事，自做出自當之，青年、成年、盛年，歷驚、歷危、歷險，在暗事好做、明事難成的跋涉中，一生有愛相隨相伴，彼此更是與有榮焉。

冀伯母，我們幾個孩子稱冀媽媽，名為羅靜宜，1987年5月24日寫給家父的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心中總記得您對朝鼎多方協助，無所不至，而我們兩家來往也遠勝親人」，家父為此而十分感慨，又回憶起從重慶到上海再到北京備嘗艱辛且難以忘懷的歲月。

第一章

留美博士冀朝鼎
隻身回國共赴
國難

一、離開家鄉後的清華記憶

冀朝鼎（1903—1963年），出生在山西汾陽建昌村，自幼好學，1912年進入太原省立模範小學學習，1916年考入清華。當時是清華學校，就是後來的清華大學，在校期間組織唯真學會，參加五四運動，1924年秋赴美國留學，被稱為清華甲子級留美學生。

當時，社會上與清華的氛圍是，注重個人對於社會之實在的貢獻。在這些唯真學會夥伴們看來，個人對於社會之實在的貢獻，要重在行檢，行檢上的「唯真」應該成為一生的遵循，「會友彼此批評，皆能開誠盡言，一發不苟；如會友中有會食（一起吃飯）時態度不佳等處，均被批評及之；具此種不苟精神，誠不枉以『唯真』命名也」。學會的成員，每人發一個銅牌，上面有養成高尚之人格的座右銘。

從注重行檢再進一步，「人活在世上就是為改良世界的」「真理所在，即趨往之」，這是冀朝鼎在清華求學時立下的志向。

冀朝鼎回憶說，清華的學生由各省保送，各省名額中有一部分保送的官僚子弟，但也公開招考幾個，因此也有貧窮人家的子弟入學，這一點和教會學校還有所不同。保送進來的官僚子弟，由於學校功課嚴格，很多都在中途開除出去了。山西與其同時入學的共六人，結果開除了五個，到畢業時只剩他一個了。

依據冀朝鼎的回憶，五四以前，清華學生的政治興趣很淡薄，

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對國家大事不關心，校內簡直沒有一點政治活動。在清華因政治事件而轟動了全校的，以五四為第一次。五四運動由北大首先發起，清華參加得遲了一些，但同學們的熱情卻很高漲。當時我帶着一個小隊到西城宣武內城絨線胡同附近演講，被軍警拘捕，送往北大三院，關了三天。這三天雖然沒有吃什麼苦頭，但同學們在裏面激昂氣憤極了。後來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把我們放出來。這次運動，清華是全力參加了的。

冀朝鼎在清華期間，課餘熱心接觸社會，聯絡工農羣眾，開展工讀活動。在「勞工神聖」的影響下，組織起「工讀團」，借了一間教室作工場，每人每天勞動一小時，幹些印信封、信紙等勞動。還在清華校園西北角一片叫「西園」的荒地上開荒種菜。冀朝鼎用五塊大洋從一位逃兵手裏買了一匹受了傷的馬，自己飼養，養肥後送給了附近一個農民。《清華周刊》報道：「吾校西園，荒地凡數十畝，歷來荒廢，無人過問。近來同學多人，邀約同志，前往開墾，或建茅舍，或鑿山穴，或飼雞禽，或養家畜……諸同學筆路藍縷，為世前驅，勤苦耐勞，以身作則，化除智識勞動階級，其必導源於此也。」他們經常到學校附近「驢車伙」「洋車伙」等工農大眾吃飯和休息的處所，去體驗勞苦大眾的疾苦，同他們交談，向他們請教。

1921年5月1日在清華建校十周年紀念並大禮堂落成典禮上，外交總長顏惠慶、美國駐華公使柯蘭發表演說，校長金邦正致開會辭。校慶期間，舉行成績展覽、畢業生宴會、體育表演和音樂會。冀朝鼎與他的同窗徐永煥等人，為《清華周刊》編輯了增刊，分發給學校附近的工人、農民及市民，「作為清華送給平民的禮物」。在這本小冊子裏，冀朝鼎以通俗易懂的文筆編寫了《人為什麼活在世上》《怎樣生活》《去做》等文章，闡述人生的意義和志趣。他說，「如今世界不好，是人的過錯，不是天命，亦不是神

意」，「人活在世上，就是為改良世界的，不是單為吃喝的」。他主張，要做一個真正的人，就應該盡他的力量去做事，盡他活在世上的責任。他說：「若有一個人永久去作，那世界便多了一個真正的人，少了一個假的人。若人人都永久去作，那人人便不愧虛生一世，作了真正的人。國家還怕不富強？世界豈能不安？」

他與他的學友們，對辦好《清華周刊》傾注了心血。他參與了言論欄目的工作，闡述了辦欄宗旨與要求。認為「定期出版物之價值程度，恆視其言論價值之程度為標準。蓋出版物之天職，為指導社會，而其會否盡此天職又恃其言論之指導能力之大小以為斷」。《清華周刊》於新聞固應注重，而於謀校務之改進，同學之幸福，及指導社會生活的短篇言論亦宜注重。現今新聞學發達，於組織與編輯法亦大有研究，將言論欄分為二部，一社論為本刊言論欄編輯發表意見之處，二自由論壇為登載教職員及同學所投來之言論。言論之性質也可分為兩種，一段論可做一小段發表意見，二常論作為成篇之言論也。稿件要求，一須具建設精神，二須文字通順，三須勿長過五千字，四須和平，勿涉及個人攻擊，五須用新式標點，六文言白話均可，七須具真名不然則以真名告編輯部。四位編輯為梁朝威（主任）、陸懋德、冀朝鼎、梅汝璈」。

冀朝鼎參加了接待印度文化泰斗泰戈爾的活動。那天晚上，學生會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歡迎泰戈爾，冀朝鼎代表全體同學致歡迎辭。《清華周刊》記載到，「辭中意氣壯巍，道東方之文獻；情意虔懇，言歡迎之熱誠，為該會之最精彩者」。泰戈爾與清華學生的談話非常輕鬆隨意，卻讓他們戀戀不捨，引以為榮。他們回來評論說，「以前清華來過很多達官貴人，但熱鬧過後，他們什麼都沒給清華留下；但泰戈爾不同，他來清華，是帶了一份極珍貴的禮物來送給我們享用，就是他那偉大的人格；他離開了清華之後，他的印象是曾常時存留在我們的腦筋裏，對於我們的行動和思想是有很大

的影響，引導我們到了一條新辟的大路上，使得我們心頭上時時刻刻地記着他的話，向前進行，就是建設世界文化的使命」。

當時，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啟超，他的幾個兒子同在清華，但卻屬於不同的省籍，大致的情況是，梁思成是廣東的，梁思永是新疆的，等等。畢業儀式上，冀朝鼎等同窗，聽梁啟超「致訓」，梁啟超是他們同級同窗梁思永的家長，又作為特別邀請的嘉賓。冀朝鼎回憶到，他對我們說，「不可忘中國為世界最不幸國家之一，美國為世界最僥倖國家之一」，「吾人應努力，為苦心奮鬥的人格之修養焉」，畢業生們受到很大激勵。

在清華，冀朝鼎也有不同的感同身受，其要者便是功成願遂並非易事，尤其是按照近現代的規則辦事更屬不易。比如，建設學生法庭，是學生自治和司法獨立的試驗，成立時就一波三折，運行則更是困難重重。冀朝鼎與他最尊重的同窗施滉，就此做了不少討論，決定參與其中。在一再延遲了的選舉中，他們都當選審判部成員。成立之初，審理案件一年內頗有幾件，如某學生與廚房衝突、某同學私用他人物品等，起初當事人皆不認錯，進入庭訊則皆供認不諱。他們就想着改進庭審制度和佈局形式，希冀更進一步。然而，時間一長，參與者熱情消退，處境每況愈下。究其原因，還是有效性差，學生法庭有判決權，卻無執行權，有賴於學校當局的推動和承認，而這種推動和承認談何容易？上述試驗便被認為「其興也勃焉，其衰也疾焉」。

此外，清華的年青人，特別是冀朝鼎要好的夥伴們，都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其中幾位都是因為抗命包辦婚姻而逃離家庭的。冀朝鼎被包辦的對象，是山西某校一位才貌出眾的女性，後攻醫學，是位名家。由於冀朝鼎的拒不從命，這門親事遂成泡影。

清華 1924 級畢業時，編輯出版了紀念刊物《清華年刊》，同

學們互相寫評語，給冀朝鼎有如下一段：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誠實正直。這一特徵使他當選學生法庭的審判官，由於有一副優美動聽的嗓子，加之能言善辯，他的口才是公認的。他自己挺滿意別人叫他「愛說話的人」。他最後幾年，主要考慮的是職業的選擇，眼下他已決定從事法律和政治，並希望成為一個實際工作者或知識的熱心家。

冀朝鼎回憶說，1924年出國以前，我代表我們的小組織去見李大釗同志，請他指出我們出國唸書的方向。我們事前用電話和他聯繫，地點約定在他家裏，大釗同志對我們很熱情、親切。大釗同志告訴我們，到美國留學，要注意了解美國的社會情況，要善於向美國人民學習。特別強調指出，留學生應該一切為了祖國，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學習對中國有用的知識。

冀朝鼎也去拜訪了辜鴻銘，卻受到強烈刺激。冀朝鼎回憶說，辜鴻銘自幼留學英國，遊歷歐洲，精通多國文字。曾為張之洞、周馥等晚清、民國初年重要政治和軍事人物的幕僚。民國初年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我們向他請教，他拖着辮子，一進屋就問我們：「你們這幾年學了點什麼？」我一想，在清華幾年，物理、化學學的也不深，就告訴他學了點英文。他說：「英文，你們懂嗎？」我們一愣，只好說：「糙！」他順手指着牆上的對聯：「淡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問我：「懂嗎？你把它翻作英文。」這一下可把我們難住了，真是不懂，結果他把我們罵了一頓。要知道，就是在這之前，《清華周刊》記載「本校英語演講比賽冀朝鼎君第一」。無疑，這件事情成為對冀朝鼎極大的激勵。

清華甲子級留美學子們，從全國不同的地方匯聚起來，為的是走出國門求知求新，在校園裏感受到幸運，也經歷了磨難，從後來的發展和結果而言，冀朝鼎走的是與多數清華學子不同的道路。清華先後培養和選送留學生一千餘人，大部分人學成回國，成為我國

科學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著名專家學者。而投身革命，且並非全部託身於知識界，雖然也有，卻為數不多，其中在共和國建立後從事和勝任外事事業的有章漢夫、喬冠華、徐永煥、章文晉等，包括冀朝鼎。專門研究清華大學歷史的專家認為，「最早的左派學生為1924級之施滉和冀朝鼎」。

總體而言，這個時期的冀朝鼎，其視野和情懷是，「天下事物，造因雖微，成果則大。」（冀朝鼎，1923年，《清華周刊》）認為儘管成事不易，而只要個人努力，如果能夠合乎天下事物發展的道理，就一定會有成效。

二、博士論文中的長河行天下

冀朝鼎1924年赴美留學，先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歷史，1926年獲得哲學學士學位；又讀兩年法律，1928年獲得法學碩士學位；1929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讀經濟學，1935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36年冀朝鼎的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獲得賽力格曼獎金，該獎金三年頒授一次，授予經濟、公法、哲學、歷史四學科博士論文最優等之一人。此論文被譽所列重要參考書目達三百餘種之多，且有在國內不見之我國歷代典籍，想見治學之勤，與學問之博，研究方法獨闢蹊徑，備致推許。

冀朝鼎在獲得學位和完成博士論文期間，一直參與了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活動。20世紀50年代，他回憶道，1927年2月，世界反帝大同盟在布魯塞爾舉行大會，我代表美國的反帝大同盟，同時也代表中國留美學生中的「中山學會」，這個學會是左派國民黨組織，在留學生中受到很廣泛的支持，編輯過一些小冊子，出了份報紙，叫《奮鬥》。參加這次大會的中國代表是廖煥星同志，他是湖南衡南人，20世紀20年代在法國加入中共，後赴蘇聯，曾任《救

國時報》主編，共和國建立後他在高級黨校工作。參加大會的中國工會代表是陳鬱等人，陳鬱是廣東寶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後來參與發動廣州起義等，1940年回國，共和國建立後任燃料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省長。當時，我替他們做翻譯，他們告訴我蔣介石已經靠不住了，要革命就要靠共產黨了。會後五六天，我展開了思想鬥爭，看來這時形勢已很明顯，要革命就要和共產黨一起搞，於是決定加入共產黨。我是1927年2月入黨的，介紹人是廖煥星同志。當時在巴黎有中共旅歐支部，我入黨後就到巴黎和他們取得聯繫，然後回到美國。回芝加哥後我寄信給唯真學會的核心朋友，告訴他們我已入黨了，並說明如果這次錯過機會，將來不易再找到旅歐支部的關係，所以來不及和他們商量就決定加入共產黨，但覺得這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也不一定非等待他們的同意不可。不想他們在這時也先後加入了黨。這是中國留美學生的第一批共產黨員，於是成立了一個中國支部，由美共領導。以後，我們去舊金山開支部大會，決定派我和原唯真學會核心的章友江回國參加「八一」起義，當時美國方面留學生會已由我們掌握，華僑大部分也掌握了。在留學生和華僑中開展革命活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要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就必須回國，大家都想回去，於是支部決定先派我們兩人回國，這是經美共同意的。我們路過柏林時，廖煥星同志正在組織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的參觀團，有向忠發、鄧中夏、蘇兆征、劉伯承、關向應等同志，後來總理（指周恩來）也去了。代表團需要翻譯，我們替他們做英文翻譯，王明等做俄文翻譯。會後把我們送到中山大學去學習，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開會時又調出來做翻譯，會後分配工作，當時參加職工國際的中國代表是鄧中夏同志，我被分配做他們的秘書兼翻譯，施滉分配到少共國際做秘書兼翻譯。1928年，美國共產黨領袖福斯特到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看見我們，他問：「你們不是要

回國去嗎？怎麼還在這兒？……」當時俄共黨內正在進行反託派的鬥爭，黨內知識分子中託派很不少，連美國《工人日報》的編輯也清除得只剩幾個人了。他對我們說：「你們要回國，就不阻止你們，要是留在這兒，不如回美國去辦報。」我們和總理（指周恩來）商量後，決定回美國參加《工人日報》的工作。於是我於1929年又回到美國去了。

回到美國後，冀朝鼎除參加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935年完成了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這個選題，是由關心和研究工人的生活狀況、中國窮困的諸種原因切入的，之後引申到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博士論文論述道：「西方的各種制度，已經嚴重地侵入了中國的生活，而中國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研究中國歷史上王朝周期造成的階級鬥爭、農民戰爭，癥結何在？出路有沒有？其中集中反映他的焦慮的是，歷史中「官僚制度的職能取決於統治集團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對人民羣眾的一般責任感」。他引申論證道，自從19世紀中葉「中國開放」後與世界相互聯繫的背景下，儘管有河流天然合理的分佈，甚至有自行肥效的土壤，卻是持久的軍事與官僚的統治，毀林開荒、圍湖造田、大型土木工程傷害民生、破壞生態，然而，民間或社會中存在着「大規模的自願聯合」和「共同合作」，依此以平衡與官僚之間的關係，促進企業、商業和事業，是「有意義的」。

這篇博士論文，論及天下長河，而言在水利卻意在國運。

享譽世界的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在其15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寫作中，就土木水利史寫作有過一個說明，指出參考文獻中特出者有以歐洲語寫成之中國水利工程史，作者為冀朝鼎，與此相當之一部以中文寫成之著作則為鄭肇經之《中國水利史》，但前者較重視種種工程成就對社會與經濟之影響，故該書不僅為一技

術史，亦為一社會史之巨著。

李約瑟還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評價冀朝鼎這部著作時寫道，「這一著作，也許是迄今為止任何西文書籍中有關中國歷史發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他還說，如果沒有這一著作以及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兩書作指導，要想寫就他的上述著作中的「水利工程」那一部分內容是不可能的。

李約瑟上述著作的扉頁上，有一行中文題字「中國科學技術史」，這行字就是冀朝鼎題寫的。這一題字，後來就成了李約瑟著作中譯本的書名，而這部原著書名的中文直譯為《中國科學與文明》。他們探討科技與文明的聯繫，他們探討水利與社會和經濟乃至政治的聯繫，可謂視野宏闊、言通古今，為考據，更為求解。

國際知名的漢學家、經濟史學家楊聯陞，與胡適交情深厚，互相唱和，終身以師禮尊之，以學術批評的嚴厲著稱，有「漢學警察」之稱，作為清華校友、留美學友，評論冀朝鼎的博士論文與胡適有不同（胡適對冀朝鼎博士論文的評論會在後文述及）。楊聯陞評論說，作者根據經濟要區（基本經濟區）的觀點考查歷代河治者對於防洪灌溉等農田水利的建設，材料搜輯得可算豐富。還分析說，最精彩的在於第三章，根據各種地方志，把歷代各地治水工作做了一番統計，以朝代及現在省份為經緯，把志書中確有朝代可稽且不十分微小的治水工作計數列入；這些見解我們容或可以閉目揣想出來，但經作者這一證明，便使人特別確信了；用新的統計方法研究歷史，得到這樣好結果的恐怕還沒有；又近來研究經濟史的頗知道注意地方志，但是到如今還不見有什麼成績，我們遠在海外的朋友反而先有這樣的成就了。

被稱「天才史學家」、20世紀中國新史學開山人之一的張蔭麟，也是作為清華校友、留美學友，認為冀朝鼎博士論文是「大刀闊斧之開山工作」。他評論說：「留美學生以西文言中國事，對於

中國學人，例無一讀價值，此為厥中少數例外之一；冀先生為一馬克思主義之服膺者，挽近案據馬克思主義講中國史者，大抵議論多而實證少，唯此書以馬氏為立足境，而根柢於邃密之探究，達以嚴整之條理，雖曰馬氏之真精神則然，今罕覩而可貴；往時作史論者每喜談所謂形勝，以亂世羣雄競爭之勝負，歸於形勝地之得失，冀氏的經濟要區（基本經濟區）之觀念似不無受形勝說之暗示，然已化腐臭為神奇矣，其經濟要區因人事而改徙，此則本書所着意發揮也。經濟要區之觀念雖不能解釋中國歷史之全部，實為了解中國歷史之一要鑰雲。同時，張蔭麟也發表了對經濟要區的不同看法，其一涉及時間之劃分者，其二涉及空間之劃分者。並提出建議說，凡科學上用作解釋基礎之單位，逾簡單逾微小則逾佳，吾人若將經濟要區之範圍縮至最小可能之限度，則所得結論，固不能推翻，亦必有異於本書所得者。其解決需求助於地理學。然吾言乃為更進一步之探討而發，而非所以求全責備於此大刀闊斧之開山工作也。」

有研究介紹，1937年，費孝通在倫敦的書舖買到冀朝鼎的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經濟鑰區》一書，該書大量運用地方志，讓他讀後頗有所感，寫下一篇《讀冀朝鼎著〈中國歷史上的經濟鑰區〉》的書評。他想看看自己曾在《親迎婚俗之研究》中嘗試過而宣告失敗的研究方法，如何在這本書中得以運用。費孝通的本科畢業論文《親迎婚俗之研究》，就是運用地方志材料為基本研究方法。他在東吳大學附中讀書時，已讀到顧頡剛的《古史辨》。顧頡剛「用民俗資料來印證歷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受到極大影響。但是，費孝通也意識到這種方法存在的問題，首先的質疑是，地方志書「所載是否可信」，但因為當時他不可能到全國去進行這項調查，因此他學習顧頡剛等人的研究方法，嘗試採用地方志這種雖不可盡信但捨此又別無他途的材料，否則「舍地方志而他求，則即此不可盡信之材料亦無矣」。在此背景下，再來看費孝通

閱讀冀朝鼎的著作之後所寫的書評，就更能清晰理解其方法論思考的脈絡。圍繞費孝通對其自身研究的反省，他對冀朝鼎的著作大量運用地方志報以同樣的反省。所以他一方面強調仍舊同意顧頡剛提倡的地方志原則，但他也特別指出，舊有的地方志問題太多，並不能視為研究社會及經濟史的大好資源，對史料本身可能存在的文本書寫、權力話語等問題鮮有反思。他更為推崇的是「在現在根據現實情形，多做社區實地研究」。費孝通認為，從一個更為長遠的歷史視角來看，現在通過實地調研進行的社區研究，亦是將來的史料，未來的社會史家可以依據這些材料來撰寫他們的社會史。

筆者認為，冀朝鼎運用地方志做研究，與費孝通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即「雖不可盡信但捨此又別無他途」，而且相較以前的正史纂修中幾乎不採用地方志的記載，已經是從「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研究了。冀朝鼎在博士論文中，還稱讚顧頡剛，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的各種資料，作了大膽地分析與比較之後，便否認了一些傳統觀點，一些想像的歷史人物與事件，恰好與實際歷史順序相反，將來新發現的證據，可能證實也可能推翻顧頡剛所作結論，但不管怎樣，他似乎已經成功地打破了一些神祕理論。在這個意義上，顧頡剛、冀朝鼎、費孝通，都如同費孝通所言，「我們的興趣並不在結論，而在達到結論的方法」。

有研究認為，冀朝鼎的這部著作應視作 20 世紀 30 年代我國社會史論戰的一部分。它雄辯地向世界表明，中國絕不是一個停滯的社會，恰恰相反，中國社會內部充滿着矛盾運動，而且按着自己特定的運動規律發展着。在該書中他也闡明了他的史學思想。最富有啟發性的有兩點：一是，他認為對當代的中國根本性問題必須進行歷史性的探索才能對其有更深刻的認識。二是，他主張在歷史研究中，應當去發現那些左右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

博士論文開篇，繪有一圖，河川之國，不僅河流眾多，而且由

於河流治理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發展，由河而江而海，「圈定黃河流域為秦漢時的基本經濟區，推進到長江下游為唐宋以後的基本經濟區，長江上游的蜀，及西江流域則為兩個經濟次要區」，元明清時期密接都城與基本經濟區之聯絡意圖在於發展海河流域為新經濟區，實現編織和統合的紐帶就是大運河，然而中國門戶開放結束了一個歷史階段，開闢了新的口岸，如上海、漢口、廣州、天津等沿海口岸，要描述新關係分析新情形，必須再造新概念。

冀朝鼎的朋友拉鐵摩爾，是著名漢學家、蒙古學家，一度擔任過蔣介石的政治顧問，親自踏勘過中國內陸邊疆。在其名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吸收了冀朝鼎的研究成果，還有着進一步的發揮和論證。他認為，有清一代從黃河中心區域轉向西北部大草原，由於沒有水路可以溝通形成「大運河」，只有通過空間上最為便利的「長城—天山」商路，「沙漠之舟」駱駝就是「航船」，「船隊」就是駝隊，這條「航道」上的商埠如歸化、張家口、古城等被形象地稱之為「旱碼頭」。

他們共同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社會分化變異的過程適應了不同的地理環境，從同一地區轉向南部、西南部和東南部，而後還轉向西北部。後來，冀朝鼎也親力親為去西北部考察，他們共同的發現是，這個歷史演變過程是同化和昇華的過程，也發現社會和文化特性的歷史持久性，但主要趨勢是一個越來越大的中國的成長，構建了文化多元主義下的「大中國」的統一性敘述。

冀朝鼎的博士論文，不是僅僅描繪了歷史宏大的圖景，更看到了中國近代的落伍，「自從 19 世紀中葉『中國開放』以來，捲入世界歷史的湍流之中，匯入世界歷史的河流」，中國的封閉狀態被打破，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在自己的博士論文《北平歷史地理》中，考察北平從邊疆之城到形成國家中心最終成為王朝都城，

論證這一歷史進程的發生、演進、終結與進入新時代。其中，引證冀朝鼎博士論文有 6 處之多，說明水利事業的變遷對國家命運興衰的歷史作用。他論證說，冀朝鼎認為水利關乎農業，而中國重要農業地區的興衰對於理解中國歷史發展至關重要。他進一步演繹到，古都北平，從政治角度來說，這座城市位置極佳，但它距離當時的主要經濟中心長江流域太遠了。自唐朝以來，長江下游地區便已經發展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農業區。在元統治者最終征服全國，國家恢復和平的時候，他們發現，國家稅收必須主要依賴長江下游地區。稅收的主要表現形式便是中國歷史上所稱的「漕糧」。大運河工程大力修建於元朝，完工於明清，它是將南方經濟中心與北方政治中心緊密聯繫起來的產物。可以說，大運河代表了當時的人們為彌補北平作為首都在經濟上的不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是，無論人們怎樣堅持，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成效卻始終不是特別顯著。侯仁之在引述冀朝鼎論述後發揮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朝末年，西方影響開始衝擊中國，幾個世紀以來相對封閉的狀態被打破，社會結構也開始發生根本變化。之後，清王朝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歷史與北京歷史都進入了新的時代。這已經是侯仁之博士論文的結尾了，他收筆時寫道，「隨着這新時代的開始，本文的研究也畫上了句號」。誠如冀朝鼎博士論文的結尾，「由於對外開放，前一段中國的歷史便告結束，對於新關係的描述與新事態的分析，則要使用新的概念了」。

冀朝鼎身體力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趟入了古代進入近代、現代的湍流、河流，還想趟開中國與世界互交互匯的湍流、河流，互交流、互貿流、互匯流、互學流……篤信天下有長河，長河行天下。

在青年學者方書生看來，冀朝鼎在博士論文中提出了一個「世紀之問」。

而事實上，我們看到，冀朝鼎通過自己的歷史研究，以及我們將要述及的他的經濟活動、潛伏者活動等等，在身體力行地回答着這個，被方書生稱之為的「世紀之問」。

方書生分析說，冀朝鼎以水利活動與「基本經濟區」為線索，將這一經濟秩序及其演化視為解釋古代中國經濟發展與王朝周期性更迭的一把鑰匙；但對於 19 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經濟空間的新變化，他認為「基本經濟區」概念已經不甚適用，「由於對外開放，前一段中國的歷史便告結束，對於新關係的描述與新事態的分析，則要使用新的概念」。

他為了回答冀朝鼎「何為中國對外開放後的新概念」這樣的提問，論述到，以南北差異為主的中國古代經濟地理格局，逐漸轉變為以東西差異為主的近代經濟地理格局，經濟增長的重心轉移到東部沿海地區與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區，並由於中國地理環境上的東海西陸、東低西高的特徵，經濟發展出現自東徂西、自海向陸的擴散趨勢。

方書生強調，如冀朝鼎所言，19 世紀中葉開啟的新變化，不僅明顯超越行政區劃的範疇，同時也超出了經濟區系理論的靜態劃分框架，按照近代以來中國產業發展與經濟空間演化的基本邏輯，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分區或拼圖的概念，更應該是一個開放經濟下時間、空間、產業發展三維交織的動態進程。

他說自己的上述議論，是嘗試着回答 80 年前冀朝鼎關於中國開放後的「世紀之問」。

英國不列顛學術院院士，主要研究水和文明起源的史蒂文·米森，在其《流動的權利：水如何塑造文明》中說，「在歷史上水一直都是一種戰爭武器，權利也是通過水來獲得的，因為利用運河可以促進貿易，而貿易一直是社會變革的驅動力」。由此，有研究者聯想到冀朝鼎對中國歷史上水利工程，尤其對京杭大運河的卓越

分析，認為這種分析與歷史學家全漢升、張家駒對唐宋經濟史的探索，幾乎共同開啟了 20 世紀中國經濟史上最重要議題「中國經濟中心南移」的序幕，接續下來就是沿海和南方自然經濟逐步解體，與世界經濟的交匯與糾纏。

願想成真，心想事成。冀朝鼎，與父母親與弟妹們，還真就親身經歷了由河而江而洋，進而匯入世界湍流的歷程。冀朝鼎的小弟弟，當年幼小的冀朝鑄，在晚年回憶這一跨江河海洋之旅說，他們都出生在黃河邊上，即黃河第二大支流的汾河畔，日本入侵後，全家渡過滔滔黃河離開祖籍地南遷，沿着滾滾長江去了重慶，再由江而洋，經新加坡橫渡碧波連連的印度洋、地中海，再由法國遠渡波濤洶湧的大西洋到達彼岸的美國，為的是結成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天下確有長河，長河可行天下。

冀朝鼎博士論文出版時，扉頁上書——謹以摯愛、崇敬與感激之情獻給他的美國妻子海麗（Harriet Levine）。

海麗是美籍猶太人，冀朝鼎與她，在漂洋的海上相識，在海輪上定情。冀朝鼎做博士論文的時候，生活十分窘迫，完全依靠海麗做工維持，讓他覺得甘苦如飴，潛心研究。博士論文完成後，受到學術界重視，1936 年在英國倫敦由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這個出版機構，是英國最成功的獨立出版社之一，以出版有意義的書籍作為公司理念，主要出版紀實作品、參考書和學術著作。稍後，牛津大學盎格魯·撒克遜學的託爾金教授的暢銷全球的《霍比特人歷險記》《魔戒三部曲》也是這家出版機構的產品。冀朝鼎博士論文英文版出版不久就有了日文版，日本學者佐渡愛三於 1939 年將其翻譯為日文出版。1972 年曾被譯為意大利文在都靈出版。1980 年加蘭德出版公司在紐約和倫敦又有了新的英文版。2019 年紐約的羅德里奇出版社再次出版。

冀朝鼎完成博士學習之後，又在紐約大學商學院華爾街銀行分院研修國際金融三年。再後來，他在美國從事過多種工作，海麗都積極參與，兩人有着共同的志趣和志向。然而，冀朝鼎後來回國，受命潛伏，致使兩人在幾十年中牽念縈懷，歷時數年的婚姻生活更是動人且悽美，有一見鍾情的「明媒正娶」，更有遷延多年的「忍痛割愛」。

即便如此，海麗卻一直自稱「冀夫人」，生有兩個兒子，冀中田、冀中民。冀朝鑄回憶說，1939 年 2 月 2 日我們到美國的船進入紐約曼哈頓的哈德遜港，大嫂海麗帶着孩子來接我們，大哥朝鼎非常高興地揮手大叫他的大兒子的英文名字——艾米勒！艾米勒！艾米勒就是冀中田，後來成為哈佛大學電腦博士，20 世紀 70 年代，也是飛越海洋，冀中田到冀朝鼎母校清華大學，為中國「填補文革空白」講授計算機課程。有清華大學教授回憶說，自從 1978 年美籍華人冀中田第一次在中國講授數據結構課開始，很多老師對課程的內容和講授方法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說是在做中學，總結出許多好的經驗，使得課程的教學比當時進步了很多。冀中田十分理解，父母這段短暫而波折卻刻骨銘心的愛情和婚姻，演化成了長久的異常的痛惜和遺憾。按照他的回憶，「爸爸常把我和弟弟的照片放在他的枕頭下面」，而在他自己的家裏存放着很多爸爸年輕時的黑白照片，包括爸爸在美國上學時演的反映華人生活的話劇劇照，「他和我的母親只生活了很短的幾年，他們的文化畢竟不同，我的母親雖然愛他，也生下了我和我弟弟，但中國解放前的混亂和落後讓我母親無法繼續在中國生活下去，所以帶着我和我弟弟從上海回到了紐約，這一分別就是永遠」。冀中田懂得，「我的父親其實是一個十分英俊的中國男人！他除了熱心參與政治，是一個了不起的經濟學家，也熱衷文藝，廣為交友，從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到美國的知名人士都是他的朋友，使他後來能成為中國共產黨最為

祕密和最重要的特工人員之一」。20世紀50年代冀朝鼎出國訪問時，兩個正在大學唸書的兒子都曾去巴黎、瑞士看望過他們的父親。冀中田在清華大學講學期間，還帶他的妻子專程去山西汾陽縣他父親的老家「尋根」。

三、為統一抗戰而奉命回國

冀朝鼎自幼學習英文，在留美同學中英文也屬上乘，1927年就參加了共產黨，後來又隱蔽在國民黨內部，歷史上被人稱「三通幹部」，英文通、美國通、國民黨通。

而他進入國民黨系統，則是有多方面的機緣和人緣，其中參加兄弟會進而成為留學生會會長，是一個重要關節。兄弟會又稱成志會，留美學生兄弟會，其成員遍佈民國財經、外交、教育、醫學、工程、法律諸界，是美國校園社交文化的產物，旨在留學生之間能夠互相幫助，沒有其他政治綱領，沒有組織地下陰謀活動，成為冀朝鼎回國後的重要人脈。

政界的孔祥熙，商界的陳光甫，以及眾多金融界人士，都是成志會成員。成志會曾經是祕密組織，後來不斷演化，相互照顧、提升國運，被認為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其中國內的清華校友、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友人數最多，冀朝鼎正是這兩所學校的校友。創建了經濟學「南開系」的著名經濟學家何廉，曾經回憶說，「我在讀研究生的第二年實在太忙，還是參加了一個中國學生聯誼會——成志會。它是最大、最認真和十分活躍的中國人聯誼會之一。我參加這個組織別無所圖，只是為了交幾個朋友以及對振興中國培養更多的興趣」。他在國民黨政界做事多年，甚至有着很高的位置，卻一直沒有參加政黨，「是以非國民黨黨員身份從政的」。何廉的治學「搭檔」，經濟學家方顯廷，在回憶中也談到成志會。他說，到

1936年為止，我們成志會共有227位成員，在人類所能觸及的各個領域以及社會事業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績，這227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兄弟般地緊密團結在一起，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作出無邊的奉獻，那是在現代中國歷史上一股巨大而不可估量的力量。

孔祥熙先後就任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後，隨着他在國民政府中地位和實力的不斷提升，成志會的重心逐漸轉移到孔祥熙身上。

在上述背景下，1936年，美共中央中國局（也稱美共中國局）安排冀朝鼎與孔祥熙建立聯繫。徐永煥1954年5月10日曾寫證明，1936年冀朝鼎與孔祥熙拉上關係，是由當時美共中央中國局受美共中央書記厄爾·白勞德的委託，指導美國共產黨的中國同志的工作，那時冀參加美國《工人日報》的編輯工作，對於和國民黨要人拉關係這個任務表示猶豫，後來他終於接受了，我也參加了這個說服工作。而美共中央中國局，是早在1927年由施滉、徐永煥、冀朝鼎等旅美中共黨員在舊金山創立，主要在舊金山、紐約、費城、麥迪遜、巴爾的摩、波士頓開展國際統戰工作。1928年4月，作為美共中央中國局的機關刊物《先鋒報》在舊金山創刊，施滉、冀朝鼎、徐永煥、章漢夫等為發起人。該報1932年9月1日到1938年7月28日的縮微膠片版本，至今仍然保存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民族研究圖書館。當時的活動十分艱辛，為了維持生計，徐永煥、施滉、冀朝鼎等人不得不在街上賣報紙，到餐館做服務員，到街頭給行人擦鞋。

1936年之後，冀朝鼎「宣佈脫黨」，轉入地下工作。實際上，在這之前美共中央中國局就把向國內輸送幹部作為一項使命，冀朝鼎被派遣回國，已經是依照慣例和常規的一種安排。當然，冀朝鼎非常出色地承擔起並完成了這一任務。在這前前後後，有施滉、蘇兆征、羅靜宜、謝創、張報、章友江、章漢夫等離美回國。

冀朝鼎脫離共產黨一事至少有三名聯邦調查局線民證實，包括一名前共產黨員聲稱，冀由於和「資產階級分子」混在一起而在紐約被開除出共產黨。冀脫黨時間看來是在1938年11月9日到1940年7月24日之間。1938年11月9日重慶外交部發給冀一本新的中國護照（簽證身份沒有透露）。而於1940年7月24日他以中國財政訪美團祕書和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專家兩個官方身份獲得了外交官簽證。

派遣冀朝鼎回國的負責人之一徐永煥，前面已經提到，他們是清華同窗，徐永煥赴美之前一度到冀朝鼎父親冀貢泉辦的政法學校任職，相互切磋，老少同歡。徐永煥赴美後，他們過從甚密，徐永煥還奮不顧身地幫助冀朝鼎「打架」，彼此之間可謂至交至親。著名教育家、中國近代力學和理論物理奠基人之一周培源與他們是清華校友，曾經回憶起他們，說冀朝鼎、徐永煥在美國被取消清華官費後，倆人一起去找電影公司工作，人家問你們會什麼，他們拉開架勢說會「中國舞蹈」，就是傳統武術，被傳為同學之誼中的佳話。而且，冀朝鼎奉命回國後，就把自己在太平洋學會研究員的工作推薦給了徐永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徐永煥填寫履歷表，把冀朝鼎作為親屬之外「有聯繫、有影響」的「社會關係」填寫在上面，還寫上彼此之間常常互相批評。

在這之前，早在1935年7月，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共產國際新戰略的形成，冀朝鼎就轉向共赴國難的思路和行動了。他所參與主辦的《今日中國》《美亞》等刊物在編輯方針上做了調整，從強調階級鬥爭到積極倡導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冀朝鼎坦率地承認，「國民黨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存在財政困難，軍費開支、貸款利息和賠償金都過高，但是中央政府沒有解決不了的財政問題」。這體現了冀朝鼎對聯合抗戰的急切心情，而事實上是喜憂參半的，他面對並要解決的迫切的問題，是讓美國民眾也了解中國抗日的緊迫形

勢。有評論認為，從1937年開始美國民眾反日情緒高漲，其中也表明冀朝鼎參與辦刊的工作是初顯成效的。而且，雖然他們是在美國創刊並發行的出版物，但是當時國內的人們也能讀到它，包括在延安也可以看到。有研究認為，「在美國的知識界、學術界開展抗日國際統一戰線的工作，而《美亞》就是他（冀朝鼎）實現角色轉換的重要舞台」。

冀朝鼎回國前後，中國迎來了一次機會——形勢所迫，全民抗戰，共赴國難，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冀朝鼎所以貴機會也。

此時，「中國最脆弱的部位可能就是金融」。冀朝鼎就是進入了這個「中國最脆弱的部位」。

「中國最脆弱的部位可能就是金融」是阿瑟·恩·楊格的判斷，他是美國財政學家，1929年被聘來華，長期留任國民政府財政顧問，直到1947年。那時，他斡旋於中美政府之間，希望美國能夠看到中國的形勢，提供更多援助以穩定幣值。他認為，中國以後可能會爆發「螺旋式通脹」，而且中國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因此亟需資金的支持，之前中英平準基金會取得了一些成功，倘若其規模能再大一點兒，基金基本可以控制住局面。他極力促成中英美平準基金會，還對中國的還款能力做了估計，「中國欠債較少，如果中國『能夠重建』，還款不會有太大問題」。這樣，之前的中英兩國組成的中英平準基金會，就有了美國的加入，成為中美英平準基金會（簡稱中美英平準會、平準會）。

1941年，冀朝鼎加入了平準會，為抗戰初期金融支持抗戰起到了積極作用，可惜因為中國金融系統不健全，政治領導層的「沒有充分理解」的「自信」，加之了解了內幕信息的中國知情人造成的「外逃資本」，成功在幾年後不再了。

即便如此，楊格在20多年後回憶時，仍然堅持認為，「平準政

策的優點必須超過其不足，我當時認為，甚至現在也仍然認為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要多得多。沒有這項政策，中國能否在長逾 8 年的全面抗戰期間避免金融崩潰是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的，也許連能否挺到珍珠港事件也未可知」。也就是說，圍繞着平準會運作的國際金融，對中國抗戰初期的支撐，起到了避免金融崩潰而波及抗戰的作用，並且迎來了珍珠港事件之後戰局對中國有利的轉換。冀朝鼎一回國，就進入了平準會。

而一旦冀朝鼎離開美國，接受回國潛伏，在意識觀念和行動指向上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也是時勢變化使然——抗戰需要彌合國共。

拉鐵摩爾曾經回顧說，冀朝鼎同其他中國人一樣，「認為國民黨應該執行一條更富戰鬥性的路線抵抗越來越猖獗的日本侵略，他們都支持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

然而，其時的冀朝鼎，可不是這樣，頗為「好鬥」。他常常回憶說，年輕時，在清華，「這時期大家都是日夜幹，佈置宣傳，參加游行，但思想內容都模糊得很，只知道反日、反二十一條，社會主義的因素很少，甚至沒有」。在美國，對不同政見的人，因為都有武術功底嗎，「常常挽起袖子就要和他們打」，「打得很英勇，生龍活虎」，清華時曾向武術教師李劍秋先生學過三年拳嘛。一次徐永煥為了幫助冀朝鼎完成演講，「人很瘦但沖出去一下就打倒三個」。冀朝鼎還做過這樣的演講——「我演說的題目是『剛才我們為什麼打架？』」這種性格被要求主演話劇，居然還得到朋友們的好評。

更深刻的變化是，「淡出公開的共產黨的色彩，而以進步知識分子的面貌出現」。在一些身居國外的「左派」朋友眼中，冀朝鼎是「勇敢的青年」，回國後不得不以「沉穩內斂甚至隱忍」示人。稱冀朝鼎為「勇敢的青年」的是武兆鎬，武兆鎬與其弟弟武兆發，

在 20 世紀 20 年代見證了冀朝鼎因政治信仰而獻身政黨政治的勇敢。武家兩兄弟，都是冀朝鼎的朋友。共和國時期，武兆鎬曾經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其胞弟武兆發為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主任、一級教授、《生物學報》主編。武兆鎬留德期間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數理，經朱德、孫炳文介紹加入中共，後來轉赴莫斯科，接受蘇聯紅軍參謀總部特種軍事訓練，結束後留在共產國際工作。武兆發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學習期間加入美共，負責美共中國局威斯康星大學分部工作，與冀朝鼎、章友江、徐永煥等成為朋友。1927 年，冀朝鼎、章友江到莫斯科，其間，還到比利時，這時冀朝鼎已經參加共產黨，他們與武兆鎬得以相識，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武兆鎬在給武兆發的書信中寫道，「冀、章二同志到莫後，曾屢道及吾弟」，「從莫斯科到比利時開會，參加國際反帝同盟大會，同行者亦有冀朝鼎，與冀朝鼎君晤談，我看冀君是個很勇敢的青年」。武兆鎬與冀朝鼎在莫斯科、布魯塞爾的晤談，可能是短暫的交往，反映的卻是冀朝鼎正式加入共產黨組織的鄭重時刻。有研究認為，「這次莫斯科之行對冀朝鼎的思想、組織和工作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到了奉命回國，為抗戰統一戰線而實現身份轉換，「冀朝鼎開始逐漸淡出公開的共產黨的色彩，而以進步知識分子的面貌出現」。確是一次「用險」。

冀朝鼎「用險」，以險用險、用險止險、用險制塞，「暗事」明做。

從「表示猶豫」到「終於接受」，需要的是心理的掙扎與平復，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污明月色，更是難以預期的持守。對國民黨，從連續多年作為對手加以抨擊，到聯合起來一起抗戰，自是艱難的轉換，卻是更大的風險。

在早作為熱血青年，冀朝鼎在美國公開刊物上，長時間不間斷

地抨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大到中美關係、南京政府財政，具體到購買飛機、農村復興、公路建設、剿共禁書，等等。冀朝鼎還喜歡演講，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學校旁邊的華盛頓公司，周周組織演講活動，他常常在演講中抨擊國民黨的弊政，還與各種身份的辯手辯論政治和社會問題。美國埃默裏大學手稿、檔案、善本圖書館，收藏了1980—1981年移交的全宗檔案——菲利普·賈菲文件，就有他整理的冀朝鼎相關文獻，包括冀朝鼎分別於1930年、1932年在美国出版的小冊子《軍閥混戰與中國革命》(*Militarist Wars and Revolution in China*)和《蘇維埃的中國》(*Soviet China*)等資料。菲利普·賈菲是美國左翼新聞人士、商人，在美國學界、政界影響甚廣，是冀朝鼎夫人海麗的表兄，他參與創建美共中央中國局外圍組織「中國人民之友社」，冀朝鼎參與了他主辦的《今日中國》《美亞》雜誌。賈菲1937年曾訪問延安，與美共領導人厄爾·白勞德關係密切。

冀朝鼎還一直關注國內的形勢，參與營救「七君子」。1936年「七君子」事件發生，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將呼籲建立國共抗日統一戰線的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等七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並投入監獄。而陶行知本來也屬於「有罪」之身，因在美國躲過一劫，這位第八位君子，旋即聯絡旅美華僑發起援救「七君子」運動，他與陸瑾、胡秋原，陳其瑗、冀朝鼎、柳無垢、李信慧等33人發表《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立即釋放「七君子」，立刻對日抗戰，切實保障人民救國運動。

冀朝鼎還介入了事關楊虎城的統戰工作。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楊虎城於次年被迫出國，前往歐美各國進行考察。在美國紐約期間，冀朝鼎與被譽為「海外華僑民主人士」的陳其瑗，對楊虎城有特別的關照和支持。陳其瑗和冀朝鼎在紐約主辦報刊，在僑胞

和美國人民中宣傳抗日救亡工作，聲譽卓著。他們知道楊將軍來到了，非常熱情地接待，除給詳盡地介紹美國社會各方面的真實情況外，對楊將軍的考察還提出寶貴的建議。通過他們的報刊刊登了歡迎的文章，還正確地介紹了楊將軍的生平事跡，報道了他宣傳抗日的活動。

冀朝鼎還受聖雄甘地之託，把印度支援中國抗戰的信息傳達給中國政府。中國抗戰爆發後，印度組織救護隊來華服務，領隊亞特醫生表示，中國此次發動抗戰，全印上下極表同情，中國此次抗戰不特為中國自身之生存，同時亦為世界人類和平而奮鬥。捐款、輸助醫藥物品及救護車，悉由印度國民大會匯寄中國。全印領袖甘地先生參加指導，同時並有長函致中國政府，託由與他同輪抵達香港的太平洋國際學會國際祕書處研究員冀朝鼎轉達。長函中表達，深望印度救護隊在華服務順利，使傷兵難民不致受更深痛苦，待中國獲得最後勝利，始離華返印。

更讓人憂心的是，冀朝鼎的清華和留美的至交施滉，在他之前1930年被派遣回國，其時施滉在被全國各省市「一律通緝」當中，通緝由內政部、教育部奉行政院訓令而行，施滉還是回國了，並任河北省委書記，後因叛徒出賣而被殺害，讓冀朝鼎心情十分沉痛。與冀朝鼎相識相熟的蘇兆征，抱病回國，因所處環境異常艱難，致使身體更加衰弱，手術過程中又發生了細菌感染，病逝於上海，也讓他十分感歎，他懷念道，「健康還未十分復原便又赴火線上去，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由蘇聯回中國是很吃苦的事，兆征同志哪裏能得着相當的食品，一路上窮盡人間辛苦，到上海不到三日便盲腸炎復發，與世長辭了」。

即便如此，有很多可能被人脅迫的「把柄」，還有很多讓人擔心的風險和處境，冀朝鼎還是毅然決然回國了。

他事後也慶幸，他在美國發表抨擊國民黨的文章，均用筆名

Richard Doonping、Hansu Chan、Huang Lowe、Futien Wang 等。他後來既幽默又苦澀地回憶說，「國民黨的人事制度有問題」，否則隱蔽的身份早就暴露了。現在可以想像，如果因此暴露了身份，還有什麼後來的「公開身份」？真真切切的用險。

不能不說，其內力和內功，是源於看到了國運、國事、國勢的變化。冀朝鼎依此借勢，「織人脈」「做生意」，運用過往的經歷、經驗以「共赴國難」。像他從 1931 年參與主辦的美國中國人民之友社會刊《今日中國》，1936 年為了在美國政府圈子裏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參與辦起的更具學術性的刊物《美亞》，所籌集和運行的資金，並不依賴於美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就靠開闢雜誌比較好的發行渠道，其籌款包括會議收入、銷售收入、講座收入、宴會收入等，一直用以支持刊物的正常運作。冀朝鼎是精明的生意人和專業的管理人。

四、潛伏助力抗戰貸款與平準基金會

與人一起做事，明者時做暗事，暗者常做明事——

冀朝鼎回國潛伏之前，曾經於 1938 年回國考察數月。《大公報》報道，「冀朝鼎博士昨由美返國抵港考察抗戰後我經濟狀況」「太平洋國際學會代表冀朝鼎抵漢將赴西南考察經濟」等，這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國際秘書處安排的任務，冀朝鼎在廣州、長沙、漢口、川、黔、滇等地開展調查。

太平洋國際學會，是一個由關心太平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問題的知識界和商界人士組成的非政府的民間學術組織，該會成立於 1925 年，對促進美國的亞洲研究有很大作用，20 世紀 50 年代以前美國出版的關於亞洲的書籍有一半是該會出版或資助出版的，鼎盛時期在美國、中國、蘇聯、日本等地設有 14 個

分會。當時的中國委員，包括胡適、蔡元培、王雲五、朱經農、黃炎培、黃郛、唐紹儀、張伯苓、林語堂、蔣夢麟、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吳經熊、丁文江、潘光旦、陳光甫、陶孟和、劉鴻生、陳衡哲、冀朝鼎（1941 年後代之以徐永煥）、陳翰笙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下設的善本及手稿圖書館收藏有陳翰笙、冀朝鼎、徐永煥等中共黨員活動的相關文獻。

具體到冀朝鼎回國調查，是考慮到，「中日事變以還，歐美各友邦人士，對我為民族生存為世界和平而抗戰，咸表同情，並予援助，為求更徹底的明瞭我國抗戰後之經濟社會情況起見，派研究員冀朝鼎博士來華調查，以便製成報告，供給各方參考，俾對中國得有透徹之了解，則於抗戰前途，定多裨補」。

其中，冀朝鼎對中國「抗戰腹地」西南地區的調查，則強調以客觀學者的觀點，調查「西南建設的成績及前途，建設西南期對外貿易發展之新趨向，以及利用外資之機會條件等，希望將來渠之報告發表後，能增進外國對我國之了解」。1938 年 12 月，冀朝鼎在重慶刊文，詳述利用美國資本資助抗張的政策建議，認為美國之前在拉丁美洲的投資遭遇問題，轉向中國投資可能性大增，其中設法讓美國資本了解在中國投資的可行性，除去普遍的宣傳，要想引起掌投資權的資本注意，非拿出十分具體的事實給他們看不可，必須很具體地說出何處何段亟待開發，包括提示實業投資需要注意的具體情形，發表此種材料除了印製成書、刊登雜誌，就是聯繫專門的學術機構，例如紐約大學商學院附設的國際財政金融學會，這是最接近投資者的機構，即便如此，也還需要從吸引小資本為主，一則輕而易舉，二則藉此為他們增加經驗，建立他們在華經營事業的信用。

依據太平洋國際學會檔案，冀朝鼎此行與國民黨高層陳誠也有互動。這批檔案保存有 1938 年 8 月冀朝鼎離美回國時致學會總幹

事愛德·卡特的明信片、卡特為保障冀朝鼎再次返回美國簽證有效與美國移民歸化局多次溝通的信件等。卡特曾向陳誠引薦冀朝鼎。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統一戰線中，陳誠兼任武漢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當時周恩來為副部長。1938年10月27日，陳誠在致卡特的手書中說：「卡德先生台鑒，八月八日手書敬悉。冀博士來時，自當遵囑多方協助。將來冀博士檢討中國經濟問題之報告書，尚希賜寄一份，以備參考為荷。」多份檔案表明，在中國問題的觀察與判斷方面，卡特深受陳翰笙、冀朝鼎的影響。而彼時的陳誠，隨着1938年1月南京政府遷至武漢，湖北成為四川大後方的門戶，國民黨內部稱他是「蔣介石的替身」「第二號人物」。

冀朝鼎結束數月的國內調查之後，撰寫了十萬餘字英文的《中國戰時經濟的發展》報告，被認為對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工業、農業、資源、金融、物價、交通運輸、人民生活等情況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和分析。這篇報告，受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學術界的重視，對美國此後確定對華政策，特別是援華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對中美貿易一再強調，珍視美國百姓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理解，維護國家的整個利益和中華民族的體面。認為「當此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美國輿論及援華運動是有極大的重要的意義」，還特別就從事華絲生意的華人商戶（簡稱華絲商）永泰公司破壞抵制仇絲事件做詳細分析。這個事件的起因是，美國民眾越來越多地了解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後，開始抵制日絲，被稱「仇絲」，「美國千千萬萬的女子，犧牲她們視為生命的美觀，穿棉襖援華」，這也波及了華絲的銷售，因為她們很難辨別日絲與華絲的區別，華絲商永泰公司就破壞抵制「仇絲」，輿論就對永泰公司進行批評。冀朝鼎公開接受採訪，公開表示，華絲在美銷售數額極為有限，在「仇絲」運動中減少了銷售，但是「不能不顧環境、時間和國家的整個

利益和中華民族的體面」，希望永泰公司立刻停止抵制「仇絲」的廣告及營業。

冀朝鼎的報告，以及相關的披露活動，在總體上，積極評價國民政府的金融和工業，為與盟國結成反法西斯戰線、與共產黨聯合抗日做思想和輿論準備。

冀朝鼎回國考察的事情，也引起中共方面的注意，八路軍新四軍香港辦事處致電中央，報告冀朝鼎回國考察回到美國後，引起反響。1940年12月24日的電文寫道，「前冀朝鼎回美後，在美已掀起反對投降分裂內戰的運動，本月收到七千美金捐款」。八路軍新四軍香港辦事處，對外稱粵華公司，以經營茶葉生意為掩護，了解國際形勢變化，宣傳抗日主張，接受和轉運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同胞的捐贈，成為對外宣傳聯絡、爭取國際支援的重要陣地。「短短兩年內就收到海外匯款220萬元和大批物資，一年內就輸送海外青年經香港到延安600多人」。上述電文稱冀朝鼎回美後美國出現了統一抗戰的「運動」，足見海內外一致抗日的同仇敵愾，也反映了冀朝鼎考察報告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

經濟學家薛葆鼎，比清華甲子級要晚去美國留學，但是對陳翰笙、冀朝鼎、徐永煥等學兄有不少真切的回憶，其中講到冀朝鼎，有非常形象的說法。他說，「冀朝鼎發揮很大的作用是因為：孔祥熙怕美國人，要拍美國的馬屁，而美國人則拚命拍冀朝鼎，因而孔祥熙也來拚命拍冀朝鼎」。

孔祥熙很看重冀朝鼎的報告。事實上，孔祥熙與宋子文之間有一種競爭，孔希望藉助冀朝鼎與美方的人脈而得到美援，以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有分析認為，冀精通中美情況，憑藉淵博學識和豐富閱歷很快博得孔在業務上的信賴，在專家身份下開展工作而不易被察覺。

前面提到的楊格，曾長期擔任蔣介石的金融顧問，也曾特別注

意到冀朝鼎，而且一直疑惑，平準基金會「祕書長是冀朝鼎，為什麼選擇他至今都不甚明瞭」，「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就被人說是共產黨，但他卻在 1938 年底左右回到中國，並加入了國民政府」，「當時的說法是他的共產黨身份已不復存在」，1944 年他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其中一些涉及冀朝鼎的事情「真是耐人尋味」，然而「在我與他接觸的 1941—1946 年期間，我沒有發現他絲毫不忠的證據」。楊格的上述評價，實際上是認為，冀朝鼎沒有搞陰謀詭計，是按照專業和規則辦事的，致力於國際聯合統一抗戰的。

1939 年底冀朝鼎由美回國潛伏時，有成志會人脈，先是在紐約到陳光甫那裏應聘。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為優秀和成功的一位金融家，被譽為「中國的摩根」。《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中，載有專門的關於陳光甫的情報。美財政部一位官員說陳光甫是「高度智慧、深深愛國和相當忠誠」的人。1936 到 1943 年，陳光甫的公職生涯到達了頂點。那時他很殷實，之前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西式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他積累了財富，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中國外貿委員會（Foreign Trade Commission）主任，1936 和 1937 年成功地談成了向美國財政部出售白銀交易。冀朝鼎應聘在陳光甫的環球進出口公司做襄理，1940 年 12 月成為環球進出口公司總務處（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代理主任，負責收集廣泛信息，用於研究和出版。實際上，這個公司是國民政府的代理機構，官商互補、商官互協，從事出口中國產品和進口美國戰略物資等業務，背後還有駐美大使胡適介入爭取抗戰外援的背景。由於美國孤立主義勢力和中立立法，美國財政部不能直接貸款給中國政府或政府的某個機構。陳光甫非常熟悉美國的政治氣候和商業作法。他建議美國把用於促進貿易的貸款交給一家公司，即中國的環球進出口公司，而公司記錄美國政府可隨時檢查。這些貸款由美國缺少的中國自然資源做擔保，包括桐油、錫、鎢和豬鬃等。出口這些資源將使中國

能夠建立重要的工業，如卡車、汽車運輸、通信、現代採礦機器和現代加工廠等。由於美國國內和外國商人的投機，桐油在 1936 年發生價格大幅波動，從 8 美分一磅漲到 40 美分一磅不等。1939 年環球進出口公司只囤不賣，商人們通常反對供應短缺和價格高昂，這時便擔心起傾銷和價格直落，使得在環球進出口公司發揮作用的六個月裏，桐油價格波動不超過半分錢。這給桐油進口商和消費者雙方都帶來好處，因為「供應持續，市價平穩，保持了正常貿易」。更進一步，有了適當的庫存，環球進出口公司成功地遏制了投機者。陳光甫被認為，是誠實、能幹的人。

陳光甫回憶，他第一次見冀朝鼎是 1939 年下半年在紐約一個中餐館。陳回憶說，「我覺得他英語很好，聘他為我的祕書，寫一篇桐油貸款報告……」陳光甫需要冀的英文寫作技巧有幾個原因：其一，陳正確地預見到環球進出口公司作為一種聯繫如果成功，可以幫助戰後中國經濟重建。因此他很重視中美合作與溝通，把環球進出口公司第一筆貸款的成效看作對未來生意至關重要的預期。其二，環球公司 45 名僱員中大多是技術出身的中國工程師、會計師和採購人員，英語不流利。其三，當時中國已經失去兩條桐油出口管道（通過中國南部和印度支那）和日本封鎖滇緬公路，急切需要疏通進出口通道，國民政府急命陳光甫立即回國，迫使陳光甫接到指示就必須啟程，而且要帶着他的私人祕書冀朝鼎。

陳光甫回國後，親赴滇緬視察。這是在戰時交通困難之下，為維持國信開闢債源，增厚抗戰力量，努力於外運之督促，冀朝鼎陪同陳光甫視察滇緬公路。滇緬公路，是沿線近 30 個縣的勞工約 20 萬人被徵集來建設的公路，這些人中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孩子，因青壯年大部分都應徵入伍，這還是包括多民族的築路大軍，漢、彝、傣、景頗……多民族勞工用大石碾等傳統工具，在一批專家的指導下，公路向前延伸，竣工不久就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

唯一的運輸通道。陳光甫、冀朝鼎一行，對這條「用手指挖出來的公路」傾注深情，提出了實施改革的安排，解決實際面臨的問題，以有利於打破日本的海上封鎖，爭取抗戰的新局面。他們還安排人把中國軍民在崎嶇的山道上運送桐油的情景攝製成紀錄片，以帶回美國，希望美國朝野能夠了解、同情和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戰。當時的報道是這樣的，冀朝鼎先是擔任陳光甫祕書，以中國財政部訪美代表團祕書身份獲得了外交官簽證，1940年7月以祕書身份陪同陳光甫經馬尼拉、碧瑤回國，考察滇西的中美貿易交通線滇緬公路的桐油外運並赴昆明、重慶。

關於桐油，特別是桐油外貿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其論述到，抗日戰爭時期，中美借款，是以桐油為信用擔保品，為2500萬美元，折合法幣為15000萬元，是1935年中國對美桐油輸出值的2.4倍。由此更加可知桐油在中國戰時財務上的地位。

美國學者如此形容中國的桐油業：桐油為中國近代在國際上最具優越資源之一的一種產業，在1932年，中國在事實上為世界唯一桐油出口國，亦即唯一商品桐油之生產者，獨佔世界桐油之市場。近代以來，有移植桐樹於世界其他各處之企圖，若干試驗培植工作亦經舉辦，但迄今為止，僅有美國一處成績較佳，得加入為商業生產之一，而其產量亦僅佔世界桐油總產量2%而已。因此認為，中國桐油的性質、數量比各國為優，其外銷高於內銷，有國際市場，帶有獨佔的性質。

二戰時期，桐油是世界級的戰略物資，其具備快速乾燥、耐腐蝕、防鏽、防水及絕緣等特性，是保養戰機、軍艦、坦克、槍炮等武器裝備的必需品。塗抹桐油可在金屬表面形成緻密氧化膜，顯著延長武器使用壽命，而當時合成材料無法替代其性能。例如，飛機機身塗刷桐油可隔絕濕氣侵蝕，艦船木甲板經桐油處理能抵禦海水

腐蝕。當時，美國近800種工業品依賴桐油生產，涉及軍工、機械、電子、化工等領域。1935年其桐油消耗量佔全球70%以上，若斷供將導致軍工生產線癱瘓。為獲取桐油，美國突破中立政策，向中國提供美元貸款，以桐油為抵押，標誌着美國放棄孤立主義，公開支持中國抗戰。

當時的新聞報道，對冀朝鼎的關注還包括，「冀氏在美國與陳光甫等委員對促進中美金融合作貢獻甚多」，尤其是冀朝鼎協助胡適、陳光甫在美國爭取到了抗戰亟需的「桐油貸款」「滇錫貸款」。

與陳光甫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著名銀行家資耀華，在談到爭取抗戰貸款時回憶說，伴隨陳光甫同行者有兩位專家，即金融方面的顧翊羣、政治方面的郭秉文，其中更有一位最得力的才華出色的冀朝鼎負責實際工作。

此外，冀朝鼎還確實辦了一些實實在在的「小」事情。例如，他的清華校友、哥倫比亞大學校友曾炳鈞，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即將離美返國之時，在街頭偶遇冀朝鼎，接受了冀的託付，押運滿載美國提供中國的P-40戰鬥機的挪威貨船S.S.Gunny號回國。因為挪威與德國是交戰國，商船常遭德國潛艇襲擊，此行極為危險，但是曾炳鈞還是毅然登船。反映了他對冀朝鼎的信任和投身統一抗戰的民族情感。

冀朝鼎在環球進出口公司任職時間很短，但是他獲得了內部觀察的重要機會，了解了公司招募、訓練和管理，有利於他1949年以後的工作。這18個月還形成了他的外貿、金融思想，認識到匯兌對中國經濟重建的重要性，以及了解西方政府和商業。

陳光甫對冀朝鼎的任用，還有着更為深入的原因。陳光甫認為，大多數國民黨官員「不想增加知識改善舉止」，「多幹事多犯錯，少幹事少犯錯，不干事不犯錯」。在這種情況下，陳光甫想看到環球進出口公司有一個特別積極而有界限的公司文化。他後來回

憶說「我們組成和訓練了精心挑選的技術工程師和商業專家隊伍」
「儘可能多僱用中國年輕人，環球進出口公司將及時提供有中美貿易實際經驗的中國人員」。這些人在戰後中美關係發展中是不可缺少的。

而且，陳光甫在國民黨內沒有任何權力基礎，因此毫無疑慮地感到冀朝鼎可以成為有用的忠實隨從。陳光甫「接受冀作為朋友」，儘管他「毫無疑問知道很多冀在政治上的過去和現在」，而冀朝鼎作為一個前共產黨員，不大可能和其他國民黨官員有深厚關係，不會沖淡其對自己的忠誠。此外，冀還認識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所重要人物愛德樂和弗蘭克·科逸。這些關係加上和陳光甫的關係，以及他在美國有關中國金融、貿易和外匯兌換的權威演講和文章，也都使冀有可能參加任何西方主導的貨幣穩定計劃。這對戰時和戰後的中國建設需要都是非常有益的。甚至，陳光甫要「把重建中國戰後經濟的重任移交給冀一代人」。

在為陳光甫工作期間，冀朝鼎常常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經常給妻子海麗打電報，不止一次想把她和兩個幼子帶過太平洋。每月 600 美元的薪水比他在美國時強多了，但是戰爭阻止了任何和解。據陳光甫回憶，在昆明時冀朝鼎接到他的美國妻子海麗從紐約發的一封電報，問他要婚姻還是要事業，如果選擇後者就離婚。冀給陳看了電報。陳說：「我勸他回去。」當冀回答說沒錢時，陳給了他 500 美金。然而在回美途中，冀朝鼎在飛機上高燒，難以續航，在乘客和機組人員幫助下，咬緊牙關，完成了這次險行，他得了胰腺炎，被迫在夏威夷的火努魯魯下飛機，待了 10 天，差點兒死去。按照後來冀朝鼎自己的回憶，自從這場重疾，死裏逃生，身體機能受到破壞，頭髮變白，牙齒開始脫落，元氣大傷。陳又電匯了 200 美元。陳說：「由此我們分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很久，陳光甫還希望，是冀朝鼎的家庭和健康問題結束了他在環

球進出口公司的工作，而不是由於他的共產主義信仰。

根據青年學者王明亮的研究，冀朝鼎在往返中美之間，還從事着祕密工作。1940 年 8 月 19 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請其轉告美共總書記白勞德，將派冀朝鼎返美從事三項重要工作：其一，招募日裔美籍共產黨員，以便打入侵佔中國的日軍內部，從事抗戰活動；其二，利用美國共產黨船員，以香港為樞紐，將中國共產黨同日本、菲律賓及美國的共產黨組織聯繫起來；其三，負責以美共中國局的名義向海外華人募捐，資助中國共產黨。這些研究的細節，見王明亮所撰《美國共產黨中國局考論》，發表在《近代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1941 年冀朝鼎利用與孔祥熙成志會和鄉誼關係，出任中美英平準基金會祕書長。中美英平準基金，由美方攤認 5000 萬美元，英方攤認 500 萬英鎊（約合 2000 萬美元），中方的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攤認 2000 萬美元，用以穩定法幣匯率和促進三國間的貿易。平準會委員會由中方 3 人（陳光甫、席德懋、貝祖詒）、美英方各一人即美方為福克斯（A. Manuel FOX）和英方為霍伯奇（Edward Hall Patch）組成。美方的福克斯曾是冀朝鼎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推薦了冀朝鼎。

冀朝鼎入職平準會，被陳光甫看作「脫離了陳光甫」，然而由於陳光甫在金融和外貿領域的地位和作用，他本人也成為中美英平準基金會的中方代表之一，還擔任了主席。有研究認為，儘管冀朝鼎與陳光甫的關係已經不似之前了，所謂「投靠了孔祥熙」，卻仍然要與陳光甫在一起做事情，實際上他們分不開。建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就是維護國內法幣的國際幣值，為抗日做貢獻和促進中國金融制度的進步。冀朝鼎和一些美國「左派」高層官員交誼甚厚，因此成為國民政府財政部與美國財政部溝通的橋樑。而陳光甫與美國政界和商界的關係，則更是公認而有目共睹的。